



历史哲学译丛

韩震主编

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荷] F. R. 安克施密特 著

韩震译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历史与转义：

隐喻的兴衰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荷] F. R. 安克施密特 著
韩 震 译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 / (荷) 安克施密特著；韩震译. —
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历史哲学译丛)

ISBN 7-80554-480-8

I. 历… II. ①安…②韩… III. 隐喻—研究 IV. I0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5464 号

© 199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年中文简体字版，经由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授权北京
出版社出版集团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人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
形式或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或图片。版权所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4039

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

LISHI YU ZHUANYI; YINYU DE XINGSHUAI

[荷] F. R. 安克施密特 著

韩 震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10.75 印张 181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54-480-8/B · 14

定价：28.00 元

鸣 谢

在这本文集中，5 篇已经发表的文章最初出现在下列地方：

《历史编纂中的语言运用》，载 H. 科尔曼编的《用语言工作：工作语境中语言使用的跨学科思考》，柏林，1989 年。

《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悖论》，载《历史和理论》，Beiheft 25，《认识和讲述历史：盎格鲁—撒克逊论争》（1986 年）。

《历史表现》，载《历史和理论》27（1988 年）。

《历史编纂中的实在性效果：历史编纂形态的动力学》，*Mededelingen van de Afdeling Letterkunde, Nieuwe Reeks, Deel 52* No. 1.，阿姆斯特丹，1989 年。

《历史编纂学和后现代主义》，载《历史和理论》28（1989 年）。

我感谢出版者允许以这种方式重印这些论文。

《历史哲学译丛》序

多年来，我对历史哲学研究有着持久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深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而且对哲学和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都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哲学的历史（history of philosophy）得到了详尽的研究，但是历史的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研究却仍然比较薄弱。为了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愿望：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欧美有关历史哲学的重要著作。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相信，这套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会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展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历史哲学，翻译介绍西方的著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停留在相互之间对差异的惊叹上，而是成为社会形成的相互塑造的力量。可以说，对目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而言，“他者”不只是相互比较中认识论上的必要参照视角，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各自本体论生成的现实的力量。换言之，我们不仅通过他者发现自己的特性，而且在自身之内就存在着他者的因素。

在欧洲，成系统的历史哲学是近代的产物。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能力大大提高，这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社会发展使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视野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从而形成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

就时间而言，往日自然经济随季节律动而循环的时间观，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形时间观所取代。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经历的多是重复的活动，很难感知人类社会的变迁，那么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往往使许多人的生活经验发生断裂。乡村小道上慢行的牛车，为风驰电掣的火车取代；飞奔的快马纵使再加鞭，与今天的超音速的飞机相比，也只能望“空”兴叹。社会加快了变化的速度，昨天的“新”东西还未等成型，到今天也许就成为明日黄花了。代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人们只能哀叹“现在是各领风骚数几天”。年龄和资历已经不是能力的表征，前辈的经验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许多年长者在新的技术产品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不得不向自己的子孙求教。如果说自然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却印证了“一切皆流，无物长驻”。历史变化已经不是哲学家的思考，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当历史断裂的缝隙比较明显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历史“连续性”问题。

就空间而言，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的结合，使人类真正获得了世界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人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依附于土地，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变换居住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

工，为人们的职业选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年复一年重复耕种的农民，变成了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推动经济联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挺进，全球化已经不只是一个口号，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总而言之，人们对全人类的联系和共同命运有了确实的感受，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进步有了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们才形成了世界历史的观念。

历史的变化使人们更容易看到社会发展断层及其连接点，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让人们可以在差异中思考人类的认同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描述特殊性和个别事件的历史学与思考普遍性和共同观念的哲学找到契合点。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产生了。

二

20 世纪，人类又经历了许多事变。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历史进步。十月革命的炮声曾经被亿万人民当作新社会出现的春雷，它的确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探索性实践既有挫折，也有教训，但是仍然给人民以希望。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因此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相互猜疑的“冷和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用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做标准，完成对世界和历史的构建，使历史终结于此。可是，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9·11”事件使“文化冲突”从观念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繁荣与发展，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即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保证其运行效率的模式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社

会主义实践就应该是一个历史探索的过程。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历史怎么样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历史演进的趋势和方向，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自然界的规律是盲目的，与人类的意识和活动无关。可是，历史是有目的、有欲望和有意志的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规律是活动规律。历史规律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的意志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确实在起作用。因为负有个人意图的人类活动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的因素，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历史规律不可能自动展现。人类历史是活动规律，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呈现出规律性；没有人类追求种种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活动。因为这种认识的结果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对当代历史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研究，其中就有以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历史的意图和效应。美国的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分化的一种塑造力量。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公开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构世界的格局。对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提出我们塑造世界历史的意识形态，争夺表达历史的话语权。

再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历史和国家史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深切的理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当前的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可能躲避这种联系，而只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联系与进程。如果我们脱离全球化联系，其结果将是自我封闭、故步自封和停滞不

前。不出海，就打不到鱼；要吃鱼就必须勇敢地驾船出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航海中学习航海技术。西方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是西方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不乏对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深层问题的感受和直觉，我们通过这种渠道，可以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要超过对手，就必须把对手的招数学到手。而且，了解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建立全球视野所必需的视阈。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三

鉴于我国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与借鉴，有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因此，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翻译和介绍西方历史哲学理论，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我们准备把历史哲学名著的翻译，作为一个持久而连续的工作进行下去。鉴于我国目前历史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在选取译介对象方面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注意不同历史哲学理论或流派的平衡。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有很大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学说和体系。如“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新叙述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等等。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系统的翻译、介绍，对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注意不同研究领域的平衡。在选择研究领域方面，我

们涉及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方面的著作，尽可能给读者一个有关西方历史哲学发展最新动态的简化了的全景图。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西方的历史观念，并保持与他们进行对话的能力。

第三，注重作者的学术影响和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我们是选择名家的名著。奥克肖特、克罗齐、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加登纳、凯尔纳、奥拉夫森等，都是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人物，他们的论著塑造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图景。对他们的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有助于我们尽快地接触并领悟西方有关研究的最高理论水平。

本丛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破，还表现在对“历史哲学”概念本身的认识上。我们认为，“历史性”不仅是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哲学观念生成的本体概念，它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意义不是先天概念外化，而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将有助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深化。另一个突破是建立在前一个突破基础之上的，由于扩大了历史性概念的适用空间，我们就把历史视野扩大到了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等领域，为今后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限于学识和水平，译丛的选材和翻译的内容肯定仍然存在某些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推进我国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韩 震

2004年12月2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

安克施密特（1945—），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历史与理论》的编委，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历史哲学家。著有《叙述逻辑》、《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关于历史学的思考》、《历史表现》、《政治表现》、《审美政治学：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主编《新历史哲学》、《隐喻与知识》等。

在构造服务于社会和政治目的的知识方面，尤其是在历史学领域，隐喻有着明显的效果。隐喻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最强有力的语言工具之一，通过把社会实在甚至把物质实在“拟人化”，隐喻把陌生的世界变得对我们熟悉起来，使我们能够在词语的真实意义上把握实在。隐喻总是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看不那么熟悉的系统。作者对隐喻在历史编纂学中发挥功能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见解独特而深邃。本书由七篇论文和一篇长篇导论组成，阅读这本著作可以帮助我们勘察作者在思想领域漫步的路径，也可以从一个视角管窥20世纪后期西方历史哲学的全景。

目 录

鸣 谢.....	1
导 论 先验论和隐喻的兴衰.....	1
第一章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六个主题	40
第二章 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悖论	51
第三章 历史编纂中的语言运用	92
第四章 历史表现.....	119
第五章 历史编纂中的实在性效果：历史编纂形态的 动力学.....	154
第六章 历史编纂学和后现代主义.....	203
第七章 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经验现象学.....	229
译名对照.....	307
译后记.....	330

导论 先验论和隐喻的兴衰

20 世纪的哲学迷恋语言现象。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视形式化的语言为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的逻辑基础。他们论证说，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通过形式分析把语言还原到它的逻辑内核，进而对逻辑内核的彻底分析可以向我们展示，所有可靠的（即科学的）知识都是由其基本的、原子论的成分构成的。而卡尔纳普则提出，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属于更大的西方哲学的一部分——起源于哲学家对有关世界的逻辑构成的适当句法规则的无知，他提供了引起逻辑实证主义争论锋芒的论题。于是，就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倡导和实践的，逻辑分析将消除西方哲学传统中大多数问题。多亏对用来解释这些问题的语言进行的逻辑分析，如果它们不能在语词的适当意义上得到解决，那么就被证明是伪问题。

在稍后的阶段，《哲学研究》时期的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特汀，还有许多其他人，转向了语言的社会维度；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许多不同的语言，恰好可以比作游戏的玩耍。游戏要求所有参与游戏的人接受游戏规则，这与讲语言的人没有任何区别。语言不再是逻辑演算，而是社会实践。因此，自然语言取代形式化的语言，转而成为哲学兴趣适当的关注

点。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拒绝现在被抛弃，转而赞成斯特劳森特有的尼采式论题，即自然语言的最一般的句法结构决定着关于我们世界的形而上学结构。^① 多亏这种社会学（或者，就如人们常说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现在接受了发展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任务，这种形而上学将论述世界的那些形而上学的结构。

但是，所有这些语言哲学共同具有的——尽管它们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假设是，语言是知识可能性和有意义思考的主要条件，因此，对当代哲学家来说，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就如同知性范畴分析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类同，人们经常指出，当代语言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两个世纪之前由康德开创的先验论纲领的新的和更富有成果的阶段。

两个紧密联系的假设奠定了当代语言哲学的基础。（我赶紧补充，这两个假设首要的重要性只来自在这篇导论中我要说的观点；在此，我并无提出任何有关语言哲学实践的般的主张之意。）第一个是方法论的假设，它回溯到早期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尔和霍布斯所采用的所谓构成分解的（*resoluto-compositional*）方法。^② 这个方法要求我们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它们的简单的组成部分。它建议，哲学家从简单问题开始，然后慢慢地、仔细地走向较大和较复杂的论题。这个“假设背后的假设”是，当运用这种方法时，不会遗漏较大和更复杂疑问的任何本质。当代语言哲学的实践对构成分解方法的接受，是几乎普遍持有的信念的结

① P. F. 斯特劳森：《单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伦敦，1971 年。

② 笛卡尔提出了发现真理的四个规则。第二个是这样写的：“de diviser chacune des difficultés que j'examinerais, en autant de parcelles qu'il se pourrait, et qu'il serait requis pour mieux les résoudre”（把每个问题分解，以致我可以尽可能多地探究部分，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它们所需要的）。（R. 笛卡尔：《谈方法》，巴黎：弗兰玛璜，1966 年，第 47 页）

果。这个信念是说，语言哲学应该从对逻辑常项、适当的名称，等等，以及词语和命题的意义的行为的探究开始。显然，这个假设与这篇导论开篇描述的逻辑原子主义有可选择的密切关系。由此，尽管作为哲学立场的逻辑原子主义遭到怀疑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只要从其方法考虑，当代语言哲学仍然是“原子主义的”。在这里，我们再次遭遇这样一个特有的悖论，总是如此关注其他学科的方法运用的哲学家，却对他们自己的方法及其内涵不关心。^① 简言之，借助于对命题（无论是单称还是全称的）和它们的构成成分，或者对命题简单而清楚的合取（conjunction）的探究，语言哲学家希望发现真理和意义的先验条件。

只要这种方法被接受，就容易赏识 20 世纪语言哲学第二个假设的可能性。根据这种假设，语言应该如何依据文本而不是单个的命题（历史学家的专业关注点！）处理复杂现实的问题，就不再视为问题；那就是说，人们在这里不愿意看到的问题，也不会还原成为在命题及其部分的分析中遇到的那种问题。当代历史哲学的大部分幸运与不幸，都可以从这个视角得到解释。就不幸而言，必须指出，历史哲学家往往冒险把这个假设用在历史哲学上。这样，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历史哲学偏爱关注历史文本的要素，像关于历史事态的单一陈述、表达因果关联的陈述或关于过去的陈述的时间视角（丹图的“叙述语句”）。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是少有的，如果有，那是哲学探究的话题。这是更加令人遗憾的，因为历史哲学的幸运不证自明地在于历史文本而不是其部分。只有历史哲学全神贯注地把历史文本视为一个整体，才能对当代历史哲学有重要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对已经在别处发现的东西的应用。如果我们想到各种学科试图通过复杂的文

^① 请见本书第五章。

本对复杂的现实提供真实的表达，那么历史学则是进入我们头脑的第一个学科。由此，历史学科如此感兴趣的東西是，它清楚地提示构成分解方法的局限。从这个视角考虑，历史哲学能够给语言哲学提供全新的起点，导致语言哲学提出新的和有趣的问题，二者在现存语言哲学参数范围内，都是无法说明（unstatable）和无法解释的。以这种方式，柯林伍德的预言——20 世纪哲学的主要工作是与 20 世纪的历史学妥协——就能够实现。^① 这样一来，历史学对当代哲学就如科学对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哲学那样重要。（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如果历史哲学没有执行这个任务，这丝毫也不是说历史哲学将与科学哲学对抗，或历史学与科学对抗。）

据说，历史哲学家仍然令人失望地不愿面对挑战。如果历史哲学处于如此可怜的状态，人们也许应该问它是否依然存在。必须面对的是历史哲学家不愿探讨哲学的金矿，他们排斥这块领地。有两个因素可以（部分地）用来解释这种不情愿。首先，历史哲学家在不久的过去曾经倾向于轻视历史研究（其成果典型地以关于过去的单个陈述加以表达）和历史编纂（它将历史研究的成果整合在整体的历史文本之中）之间区别的重要性，并且拒绝给予后者相对前者的某种自主的和独立的地位。结果，大多数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的哲学。经验事实的理论承载性的主题大都经常证明是拒斥这一区分的。不用说，将历史研究的成果整合在历史编纂之中的范围内，这种整合的目标并不只是指向对决定描述的相关理论的确认或再创作，这个主题不可避免地陷于证实对区分的拒斥。

但是，更重要的，它可以表明文本在逻辑上是区别于（单

^① R. G. 柯林伍德：《自传》，牛津，1970 年，第 79 页。

一的)命题的,而且由此历史编纂(等同于历史学家的文本)决不能完全还原为历史研究的结果(等同于关于历史事态的单一命题)。例如,假定我们有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本,那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在文本中不描述法国大革命而只纯粹指称它的那些要素和不指称法国大革命而描绘它的某些特征的那些要素之间,对两者作出清楚的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人们甚至论证指称要素和要描绘意图指称对象的那些要素之间是完全一致的。^①那么,在这里,我们观察到,从逻辑的观点看,文本与绘画有共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观看戈雅的威灵顿公爵肖像,在只指谓公爵的东西和戈雅在自己的绘画中企图描绘公爵特征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同样是不可能的。不过,在陈述的例子中,区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符合陈述的主项和谓项的功能。这样,我们在此发现陈述一方和另一方历史文本或画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由于这种逻辑,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之间区分的必要性就是无可怀疑的。其根据在于,如果把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还原到它的构成部分,就如我们运用构成分析的方法那样,就会丧失某些本质的东西。

第二个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历史哲学家为什么不情愿发展对历史文本有贡献的语言哲学:由于语言哲学并没有向历史哲学家提供有用的见解,最明显的策略是转向文学理论。由于文学理论习惯于把文本当作一个整体(即小说),因而期待在这里能够发现某些有助于历史哲学家分析历史文本的理智工具,似乎是合理的。可是,人们或许有正当的理由怀疑作为这种(非存在)类型的语言哲学的代用品的文学理论。这是一个糟糕的预兆,由热

① 见安克施密特:《陈述、文本和图景》,载 F. R. 安克施密特和 H. 凯尔纳主编:《新历史哲学》,伦敦,1994 年。